

## 入山猶未晚：

# 明宗室女朱中楣的易代經歷與鄉國書寫

陳逸雯\*

明清鼎革向為中國易代研究中備受矚目的課題，其中士人出處及明遺民尤為關注焦點，然而相較於眾多士人的人物研究，女性人物的研究明顯較少。本文選擇的女性個案是一位出身宗室，亡國後依然心念朱明，但其夫李元鼎（1595-1670）出仕新朝的才女朱中楣（1622-1672），她的複雜處境充分反映了鼎革時期的特殊性。本文旨在考察朱中楣在鼎革巨變中的經歷及其對家國的態度與心境，故聚焦於其作品中與家鄉和故國有關的書寫，藉此耙梳這位出身明朝宗室的「貳臣」之側室，如何面對甲申之變和入清後的生活，發掘女性訴說的聲音。從朱中楣和李元鼎的互動，可明顯看出朱氏較其夫懷有更堅定的隱居之志。透過朱中楣的書寫及易代際遇的考察，可以映現明清鼎革中知識女性對家國之變的感受，朱中楣的家國之痛並不亞於士人，知識女性思想情志之主體性，亦可見其一斑。

關鍵詞：明清鼎革、朱中楣、李元鼎、才女、貳臣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Email: yuihtumtw@gmail.com。

## 前言

在明清鼎革的研究中，士人出處及明遺民向為熱門課題，研究成果豐碩。<sup>1</sup>但士人出處的討論勢必受到性別的侷限，無法將同時代的女性也納入關注對象，這對擁有比前代更多女性材料的明清時期而言更顯可惜。儘管相較於男性士大夫有多種文類可以傳遞想法，多數才女僅能透過詩詞表達，<sup>2</sup>研究材料難免較男性文人來得單一，但這無損於我們從中得到一手女性聲音的價值。學者李惠儀就認為這些才女在遭逢世亂時，提筆記錄其經歷，見證世亂、反思歷史、追懷往昔，具有「以詩為史」、「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詩史」精神。<sup>3</sup>這些知識女性的書寫，更提供我們一窺傳統史書中難以得知的易代之際女性心態。這也是目前明清鼎革的研究中較少受到討論的課題，筆者欲由

---

<sup>1</sup> 參見王成勉的兩篇研究回顧：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食貨月刊復刊》，15：9、10（1986），頁 65-75。亦收入王成勉著，《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12），頁 1-14。以及〈再論明末士人之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收入《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一）》（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231-242。該文亦收入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頁 15-31。

<sup>2</sup> 明清雖然也有女性作家著力於創作彈詞小說、戲劇等，但詩詞仍是才女書寫的最主要文類，通常彈詞小說的女作家也會有詩詞傳世，但並不是所有女作家都曾寫作彈詞小說。有關女性彈詞小說的代表研究可見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胡曉真認為彈詞的女性化特質是婦女史研究上極為寶貴的材料，傳統上所有文類，詩詞歌賦無不是男性為主導，唯有彈詞是女性佔上風的領域（女性為主，但不代表沒有男性參與）。但彈詞是「被賦予性別」的文學，其象徵意義可能大於現實背景，這個性別象徵可能是導致彈詞在文學史上沒落的原因。而戲曲文類，就今所知，明清婦女從事戲劇創作始於晚明萬曆，止於晚清光緒年間，已知女劇作家明代有六人、清代有十九人，但劇作散佚的情況頗為嚴重。參見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頁 31-32。

<sup>3</sup> 李惠儀，〈明清之際的女子詩詞與性別界限〉，收入方秀潔（Grace S. Fong）、魏愛蓮（Ellen Widner）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175、198-199。另見李惠儀專著：Wai-y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該書關注焦點為女子在易代書寫中所代表的議論、抒情和想像空間，包括女性著作、男子仿作閨音或署名女子的書寫，如何藉由女性形象表達亡國哀思、緬懷往昔，甚至追究亡國責任。

此切入，從不同性別的視角，察考易代之際的處境變化與思想心境。

本文所探討的個案是一位身分特殊，又有著作傳世的才女——朱中楣（1622-1672），朱中楣出身明朝宗室，她的丈夫則是一位被後世貼上「貳臣」標籤的士人——李元鼎（1595-1670）。李元鼎身仕明清兩朝，在乾隆皇帝下令編纂的《貳臣傳》中被列入乙編，且因曾投降過李自成（1605-1645），更被收於乙編下類「明臣從賊後投誠本朝及賊黨降明後投誠本朝者」，<sup>4</sup>成為乾隆教忠教孝的負面人物。<sup>5</sup>朱中楣身兼宗室女與「貳臣」之側室的身分，恰好反映了鼎革之際複雜的時代處境。然而，或因其文學成就未足以成名家，或因沒有像柳如是那般充滿戲劇性的經歷，過去鮮少受到注意，目前相關研究成果極少。<sup>6</sup>

朱中楣，字懿則，一字遠山，江西南昌人，生於明天啟二年（1622），卒於清康熙十一年（1672），享年五十一歲。<sup>7</sup>為明宗室輔國中尉朱議汶次女、吉

<sup>4</sup> [清]清國史館，《欽定國史貳臣表傳》，冊1（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清內府朱絲欄寫本），卷首，〈乾隆上諭〉，無編頁碼。

<sup>5</sup> 《貳臣傳》的編纂體現了乾隆皇帝積極透過史書達到教化臣民的政治目的，相關研究可參考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1994），頁176-177；此文亦收入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陳永明，〈乾隆《貳臣傳》立傳原則平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4（2013），頁753-784。

<sup>6</sup> 朱中楣相關研究寥寥可數，且多為點的出現，如鄧紅梅在《女性詞史》中將朱中楣置於〈花影迷離的清代前期詞壇〉中與柳如是、李因、顧道喜並列為由明入清的代表，她們都是對明朝有較深感情的詞人，詳見《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235-244；朱中楣的部分為頁239-242。特以朱中楣為主題的研究非常之少，且多篇幅短小，如趙雪沛，〈清疏曠放的林下風致——明宗室女詞人朱中楣詞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4（2004），頁132-140。曹月，〈荒城處處傷離黍，舊燕飛飛覓畫梁——論朱中楣詩詞中的「家國之思」〉，《文教資料》，2013：29（2013），頁46-48。趙宣竹，〈女詞人朱中楣《石園隨草詩餘》研究〉，《雲夢學刊》，36：4（2015），頁112-118。李小榮則延續對夫妻唱和詩的關注，研究過朱中楣與李元鼎的唱和，李氏認為朱中楣與李元鼎的唱和很大程度上遵守著夫婦之道，詳見〈夫唱婦隨：明清過渡時期李元鼎和朱中楣夫妻的詩歌唱和〉，收入曹虹、蔣寅、張宏生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輯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頁144-160。學位論文則有戴曉燕，〈朱中楣之“夫唱婦隨”：明清之際才女文化個案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該文討論朱中楣的生平、作品、夫婦之間的關係及交際圈，對明清之際才女的地位仍無法脫離附庸，其交際圈仍集中於女性之間，且常受丈夫仕途變化影響往來。

<sup>7</sup>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25，〈顯妣朱淑人行述〉，

水少司馬李元鼎側室、<sup>8</sup>禮部尚書李振裕（1641-1707）之母。其父朱議汶，字遜陵，系出明瑞昌王府，為朱統鏗第三子；母親汪氏亦出身名家之女。

朱中楣在浩瀚的文學史上雖不特別奪目，但在當時也是有聲名的才女，時人彭士望（1610-1683）稱：「詩傳海內垂二十年」<sup>9</sup>、時人熊文舉（1595-1668）謂：「豫章有遠山夫人者，淑德著於閨幃，詩詞溢於海寧。蓋班婕妤、左貴嬪、謝道韞以上之才，而彌來名媛卿閥之所僅見者也」<sup>10</sup>、清人周銘（1641-?）所輯《林下詞選》指出：「熊少宰稱其詩餘穠纖倩麗，不減易安。近日陳伯璣、李雲田遴選國雅，海內閨秀僅得二人，惟夫人與黃偕令而已。」<sup>11</sup>可見她的作品在當時有一定的流傳程度。

朱中楣在崇禎十二年（1639）與李元鼎（1595-1670）成婚，當年朱中楣十八歲，李元鼎四十四歲，崇禎十五年（1642）生子振裕。李元鼎，字吉甫，號梅公，江西吉水人，明天啓二年（1622）進士，明朝時官至光祿寺少卿。

明亡後，清廷於順治元年（1644）廣搜遺老，起用李元鼎。李元鼎雖再次入朝為官，然宦途驚濤，並不平順，曾兩度進出清朝官場，順治元年（1644）出仕，順治四年（1647）就因推薦人事受牽連被免職。<sup>12</sup>因順治五年（1648）江

頁 823。載：「淑人生於天啟壬戌年五月初二子時，歿於今康熙壬子年二月十九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一。」

<sup>8</sup> 朱中楣身為明宗室女，何以嫁為側室，筆者亦曾感疑惑，惜囿於史料所限，難以有確切的推論。可確知的是朱中楣成婚時年為十八，李元鼎年已四十四，顯非李元鼎之初婚。朱議汶因中楣聰穎，未有中意之良配，直到與元鼎相交，深為相得，故將愛女許配給李元鼎。而甲申國變時朱中楣的託孤之言，可確定李元鼎的正室羅夫人身在李家故鄉，並未隨李元鼎一同在外宦遊。惜朱中楣的作品中未曾寫及羅夫人事，難考兩位夫人的關係如何。但由朱、李二人唱和之作，可知朱中楣雖身為側室，但無論在明，還是在清，她真正是與李元鼎共同經歷所有宦海浮沉的夫人。更詳細的朱中楣生平，可參拙作〈鄉國半愁烟：明清鼎革與徐燦、朱中楣的家國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第二章第二節，朱中楣事略。

<sup>9</sup> 〔清〕彭士望，〈亦園嗣響序〉，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亦園嗣響》（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18，頁 115。

<sup>10</sup> 〔清〕熊文舉，《侶鷗閣近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壽遠山夫人序〉，頁 41。

<sup>11</sup> 〔清〕周銘編，《林下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0，〈國朝詩〉，頁 627。

<sup>12</sup> 順治四年三月，李元鼎曾薦門人倪先任給順天巡撫柳寅東（?-1656），後因逮捕的盜賊劉傑等人稱倪先任亦為同黨，刑部查證屬實，將倪先任正法。故刑部議李元鼎

西總兵金聲桓(?-1649)與部降王得仁(?-1649)於江西起兵反清，<sup>13</sup>戰亂阻路，元鼎與中楣未能回鄉。<sup>14</sup>順治八年(1651)得吏部舉薦，李元鼎恢復原官兵部右侍郎，任殿試讀卷官，不久又升兵部左侍郎。但順治十年(1653)就受到總兵任珍案牽連，<sup>15</sup>順治皇帝(1638-1661)盛怒下，滿漢官員多人被逮下獄，元鼎一度論絞，朱中楣也決意其夫若死，絕不獨活。<sup>16</sup>李元鼎後幸獲免死，後於同年出京，僑居寶應縣暨社湖宅邸。<sup>17</sup>順治十四年(1657)冬天，終於舉家南歸，返南昌定居。

朱中楣現存的作品共有六部，分別為《隨草》上下兩卷、《隨草續編》一卷、《亦園嗣響》一卷，以及和李元鼎的唱和之作《隨草詩餘》一卷、《鏡閣新聲》一卷、《唱和初集》上下兩卷，皆收於李元鼎著、其子李振裕編的

---

薦用匪人，雖稱不知為盜，但未可盡信，應擬斬，後雖免死但被革職。〔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冊3(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1，頁254。順治四年三月甲寅條：「初，兵部侍郎李元鼎薦其門下人倪先任，於順天巡撫柳寅東。寅東收用，給以牌劄，尋馬賊劉傑等被獲，稱先任亦其同黨。事聞，下刑部議，擬元鼎棄市，寅東革職杖責。得旨，免元鼎死及寅東杖責，俱革職。」

<sup>13</sup>順治五年閏三月，因江西總兵金聲桓(?-1649)自以功高未得封爵，心生不滿，與部降王得仁(?-1649)於江西起兵反清，四月廣東提督李成棟(?-1649)在廣東響應，烽煙大起。隔年正月，金聲桓戰敗中箭，投水而死。詳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80，〈逆臣·金聲桓傳〉，頁6687-6688。

<sup>14</sup>〔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25，〈顯妣朱淑人行述〉，頁821。

<sup>15</sup>總兵任珍因妻妾與人通姦，私殺妻妾，因懼罪而賄賂兵部刑部，賄賂一事曝光後於順治十年二月被革世職一半與降等。三月其婢告發任珍罪謫後家居怨望，語出不軌，有奸謀，刑部審議後擬將其處死。順治皇帝以任珍有過大功，召集官員重新再議。刑部滿漢官員和九卿科道衙門滿州官員主張按刑部議處死，另一眾有二十八名漢人官員，主張任珍並不認罪，且無其他人證物證，不宜就此定案。順治皇帝看過這二十八名漢人官員之議後，甚為惱怒，後更一度降旨欲對這批漢官加以嚴懲。由順治帝的諭旨知這批漢官之所以受到懲罰，關鍵在於他們不贊同滿臣依皇帝旨意而定的擬議，反而集一批漢臣另議，與滿議相左。用意在使漢官知道今後莫與皇帝旨意相違，莫與滿官相抗。李元鼎因任職於兵部，故於此案中受到牽連。

<sup>16</sup>李振裕有云：「先公赴召，再入長安，風波宦海，駭浪驚濤。淑人草疏，誓殉于井，牽兒付母，存孤心炯。事白九重，君恩浩蕩。」參見〔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23，〈祭乳母文〉，頁802。

<sup>17</sup>李振裕在〈先府君行述〉提到：「及襁被南還，江西烽火未靖，遂止暨社湖，湖屬寶應縣，為府君鄉試房師李淮南先生茂英故里也，先生第三子藻先與府君世好，遂分宅而居。」參見〔清〕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8，〈先府君行述〉，頁463。按：暨社湖位於今中國江蘇省高郵縣西北。

《石園全集》中。<sup>18</sup>康熙四十二年（1703）李振裕奏疏中提及編書動機云：「歷官兵部左侍郎，平生淡泊無營，性耽吟咏。臣母朱氏內則自嫻，唱酬成帙，雖下里之危辭，無關典冊，先人之手澤未忍湮淪」，<sup>19</sup>因此整理父母著作刊刻成書。<sup>20</sup>

筆者認為朱中楣的經歷與作品，可為鼎革時代呈現具體的女性身影。身處明清之際的朱中楣，雖無出仕與否的問題，但同樣必須面對家國認同的抉擇，以及亡國的苦痛與遭際。本文試圖透過朱中楣的作品，考察易代之際女性對於國變與家變的感受和反應，以及面臨丈夫身仕兩朝後的心境和自處，期盼為明清鼎革的研究發掘更多的女性聲音，並從不同的面向關注遺民與「貳臣」的課題。

## 一、甲申國變的時刻

朱中楣婚後不過四年左右，就遭逢 1644 年甲申之變。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1606-1645）攻至北京，李元鼎的族叔李邦華（?-1644）自縊殉國，<sup>21</sup>留有絕命詩一首：「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sup>22</sup>《江西通志》與《吉水縣志》皆記載李邦華殉死之後，李元鼎守柩旁不忍離去，遇賊相逼，以兵刃脅迫，導致他右臂幾乎折斷，

<sup>18</sup>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

<sup>19</sup> [清]李振裕，〈為恭進遺集懇祈御覽事〉，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頁 1。

<sup>20</sup> 本文所用版本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雍正修版印本。

<sup>21</sup> 李邦華，字孟闇，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涇縣知縣。邦華被視為東林黨人，萬曆四十四年以疾歸鄉，萬曆四十五年出為山東參議，後歷任光祿少卿、右僉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請帝固守京師，未得反應。十八日，外城陷，逃至文信國祠，十九日，內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遂自縊而死。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清廷賜諡忠肅。詳見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265，〈列傳第一百五十三·李邦華〉，頁 6841-6846。

<sup>22</sup>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卷 265，〈列傳第一百五十三·李邦華〉，頁 6846。

終不降。<sup>23</sup>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1611-1644, 在位 1628-1644)帶著太監王承恩(?-1644)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

李振裕記有李元鼎原想隨李邦華一同殉國一事，以及朱中楣與丈夫生死與共的心志：

國難，家忠肅公(李邦華)靖節，大人矢志相從。時傳獻賊兵踞江楚，家慈徐慰之曰：「獻賊所過，殺人無噍類，今南北音絕，家問未卜，所存僅呱呱泣耳，君以身殉國，予當以身殉君，則誰為撫孤者？宗祀安可忽也？」<sup>24</sup>

朱中楣雖以家族承襲為由勸李元鼎不要殉死，但也傳達了她絕不獨活的意念。若李元鼎決意殉國，她亦會理所當為地殉夫，不會為了延續李家宗祀撫孤獨活。身為朱姓宗室之女，國亡之時，母家亦破，朱中楣對國難的痛必不比李元鼎稍減。值得注意的是，朱中楣雖是天潢後裔，也守著傳統的婦女價值觀，即男性的效忠對象為君主，女性的效忠對象則是丈夫。朱中楣將李家置於更重要的位置，無論是以死相隨，或以宗祀勸慰李元鼎，朱中楣都實踐古代女子「出嫁從夫」的行為準則。

根據李振裕的記述，鼎革時動盪驚險，朱中楣一度無法顧及幼兒，仰賴乳母尹氏保護孩子。<sup>25</sup>避難時更曾交代乳母尹氏，倘若有難，自己惟有一死，請尹氏將兒子帶回李元鼎的老家，交給正室羅夫人撫養：

淑人挈不孝孤避難津門，每誡乳媪尹氏曰：「汝忠誠可託，有難，吾惟一死。此子可挈還故里交羅夫人，無異己出也。」<sup>26</sup>

順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稱帝，授李元鼎為光祿寺

<sup>23</sup> [清]于成龍等修，[清]杜果、[清]陳名等纂，[康熙]《江西通志》，冊2(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卷36，〈吉安府·人物〉，頁288。載：「甲申賊陷京師，忠肅邦華殉難死，鼎守揮旁不忍去，為賊所刳以刀環撞右臂幾折，終不屈。」[清]周樹槐等纂修，[道光]《吉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22，〈人物志〉，頁1140。載：「甲申京師陷，族叔邦華殉難死，元鼎守樞旁不忍去，賊逼不降。」

<sup>24</sup>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17，〈乞言引〉，頁735-736。

<sup>25</sup>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23，〈祭乳母文〉，頁802。載：「癸未，寇移九廟，神京陸沈，豕突狼跳。先公、淑人義不顧兒，母保擁之，圖安於危重。」按：癸未年即崇禎十六年。

<sup>26</sup>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25，〈顯妣朱淑人行述〉，頁821。

少卿。五月初三日清軍在多爾袞率領下入主北京，李元鼎亦在同年投降。<sup>27</sup>清兵入關時，李振裕尚在襁褓之年，此經歷應是年歲稍長後聽人口述得知，但他在多年之後，為過世的母親寫行述時卻仍清楚記得，早已做好隨時從死準備的母親應給他留下強烈的印象。

熊文舉〈壽遠山夫人序〉亦提到朱中楣在這場鼎革巨變中的堅毅身影，說：

諸凡通顯榮龐，淋漓患難，兵火風濤，艱辛險阻，無不備歷。而夫人貞之，以識以學，雖處萬變而不失其常。時而我黼子珮，時而左圖右史，時而跋胡蹶尾，時而坐膽臥茶。夫人視若四時風雨之序，不怨不尤，無屈無撓。用能佐少司馬，道與風雲共泰，名同日月爭光。<sup>28</sup>

熊文舉讚美朱中楣以其學識，於患難中處變不驚、不屈不撓，成為李元鼎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李楷（1603-1670）替《隨草》作序時也提及：「遠山夫人雞鳴輔佐，多歷年所，榮悴同之，相與黽勉。」<sup>29</sup>李元鼎便曾自言：

且滄桑更易，河山曠邈，余既遭時弗逮，又賦命不猶。從刀鋒劍血中，萬死一生，不知凡幾，皆內子周旋而左右之。嗟乎！境遇抑良苦矣。然居常絕無侘傺怨懟之色，遇變復無兒女眷戀牽顧之情。蓋其幼嫻禮訓，長好詩書，每閒居相對，私與揚扆，凡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與夫古今治亂興亡之故、仕宦升沈顯晦之數，未嘗不若燭照而數計。故余素位而行，不以險夷生死嬰其心，則內子之力居多焉。<sup>30</sup>

李元鼎特別強調朱中楣的識見不凡，遇變故無扭捏之狀，並能與丈夫談論朝政得失、人才賢否、歷史興亡、仕宦升沉等閨閣之外的事務。儘管我們已難具體得知朱中楣對政治上更明確的看法，但透過李元鼎的側寫，可確定她對時局、政事、歷史，皆具有敏銳的感知和積極的關懷。

值得注意的是，甲申之變當年的春天，朱中楣就已經表達出寧願返鄉的

<sup>27</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 79，〈貳臣傳乙·李元鼎傳〉，頁 6600。

<sup>28</sup> [清] 熊文舉，《侶鷗閣近集》，卷 1，〈壽遠山夫人序〉，頁 41。

<sup>29</sup> [清] 李楷，〈再序〉，收入 [清] 朱中楣、[清] 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上》，卷 13，頁 80。

<sup>30</sup> [清] 李元鼎，〈序〉，收入 [清] 朱中楣、[清] 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上》，卷 13，頁 80。



心情：「屢逢佳節動歸思，卻戀微官去較遲。」<sup>31</sup>下筆雖然含蓄，但已足以看出她不喜李元鼎未果斷離開官場，甚至稍帶責備。詩中所述的「微官」是李自成時期還是順治時期的官職雖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時朱中楣已有寧可丈夫拋棄官職，一同歸鄉的志願。

## 二、懷鄉愁與黍離傷

綜觀朱中楣的作品，思鄉之作的比例很高，明亡前後的思鄉表達又有所不同。明崇禎年間，朱中楣的思鄉書寫核心是思親情感，而明亡後的思鄉書寫則揉雜了亡國之痛。作於崇禎十三年（1640）的〈季冬閒詠并序〉，可為朱氏明朝時期懷鄉思親的代表：

舟次感懷，每有懷母之句，夫子輒言曰：「親舍白雲，勞臣北山，毋乃似乎。」余唯唯。但觀歲行將近，春色漸來，天長水闊，未免有情，何能遣此，因作一詩以「朝暮思親」冠於各句之首，相與一笑識之。  
朝雲作合繫青山，暮霧溶溶水拂顏。  
思到春還冬欲盡，親看漁火下前灣。<sup>32</sup>

序中對創作背景做了說明，朱中楣因思母之情未能消滅，故作這首用「朝暮思親」四字為句首的藏頭詩，聊以排遣。「朝暮思親」四字，正可作為朱中楣崇禎時期思鄉書寫的註腳，與明亡後在思鄉中潛藏亡國之悲的情感層次有所不同。

順治二年（1645）到三年（1646）間，朱中楣所寫的〈聞子規〉一首，將不得歸的無奈寫得淋漓盡致，此時的歸去已非單純的思鄉思親情緒，更隱含有政治上的歸隱意涵：

忽聽啼鴉柳外飛，聲聲相喚不如歸。

<sup>31</sup> [清]朱中楣，〈燕臺竹枝詞·其二〉，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上》，卷13，頁85。此作為《隨草》卷上最後一首詩，其前為〈甲申元旦〉，其後《隨草》卷下第一首為〈夏日雨餘〉，且詩中寫及「春酒」，故推測寫作時間為崇禎十七年（1644）春天。

<sup>32</sup> [清]朱中楣，〈季冬閒詠并序〉，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上》，卷13，頁82。

人歸何似春歸易，芳草萋萋送落暉。<sup>33</sup>

杜鵑鳥的啼聲所代表的思鄉意象本十分濃烈，在此詩中又被朱中楣極大化，以「聲聲相喚」把「不如歸去」的啼聲寫成一個不間斷、持續反覆的存在。然而，心意愈堅，不得歸鄉之苦愈增。

官場多變，李元鼎任官未久，順治四年（1647）就因其薦舉的門人倪先任與盜賊為黨，受連累，險遭死劫，後雖免死但被革職。<sup>34</sup>此時朱中楣先離開北京，寫有〈出都寓津門候梅君不至偶成卻寄二首〉，詩中有云：「雁聲遠度關河冷，早策歸鞭歲欲闌。」<sup>35</sup>丈夫被免職，使得朱中楣有機會毫不掩飾地直抒心志，更積極地催夫早歸。又曾說：「清風送我出官衙，露白橙黃可到家。」<sup>36</sup>以輕快的語氣提到離開官場一事，充滿對返鄉的期待。可見朱中楣對於丈夫離開官場感到欣喜，雖然這次的離開，乃被迫為之，以「清風」解釋出官衙的推力，可能用此暗喻清廷革職李元鼎事。不過當時由於江西用兵，戰火阻隔，朱中楣未能如願南返。寓居其間，朱中楣仍密集地書寫思歸之情，大嘆「天涯何日是歸期」。<sup>37</sup>

朱中楣始終認為身在北京的自己是永遠的客人，常以客自比，謂：「旅客強吟詩。……極目鄉關遠，歸鴻動我思。」<sup>38</sup>在〈歲晚寄意〉一詩中，則將急歸之心與對京城的憂懼寫得更清晰：

<sup>33</sup> [清]朱中楣，〈聞子規〉，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5。

<sup>34</sup> 此事除了《清實錄》的記載外，亦可參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79，〈貳臣傳乙·李元鼎傳〉，頁6601。

<sup>35</sup> [清]朱中楣，〈出都寓津門候梅君不至偶成卻寄二首·其一〉，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倡和初集上》，卷11，頁72。收入在《石園全集·隨草下》的〈舟行贈梅君〉、〈寒食〉二篇，介於〈丁亥元日試筆〉〈戊子九日感懷〉之間，推測約作於順治四年。參見[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6-88。

<sup>36</sup> [清]朱中楣，〈舟行贈梅君〉，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7。約作於順治四年。

<sup>37</sup> [清]朱中楣，〈寒食〉，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7。約作於順治四年。

<sup>38</sup> [清]朱中楣，〈春睡〉，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8。作於順治五年到順治八年間。收入在《石園全集·隨草下》的〈春睡〉、〈歲晚寄意〉二篇介於〈戊子九日感懷〉及〈辛卯五月隨梅君北上，夜泊橋頭，風

歲暮歸應迫，春回刻漸長。  
倩鴻將短句，趁月理行裝。  
自有刀環約，何須滯上方。<sup>39</sup>

一年即將結束，朱中楣所寄意的心願就是何時能歸家鄉，所問的對象自然是李元鼎。吐露亟欲速整行裝出發的想法，以及認為京城之地世事難料、險患無常，詢問丈夫何須多所留滯呢？

儘管朱中楣認為無須再滯留北方，但決定的主宰權並不在她身上，甚至李元鼎也未能完全掌握。順治八年（1651）元鼎奉命回京復任原官，這是他第二次出仕清朝。北上赴任途中，朱中楣在船上茫然不安地寫下〈辛卯五月隨梅君北上，夜泊橋頭，風雨驟至漫賦〉：

湖光萬頃接遙天，滿目蒼茫異去年。  
五月長征承簡命，三更嚴柝對戈船。  
層雲杳靄迷鳧岫，蔓草菲微泛鷺田。  
為問老康何事怖，夜來風雨隔邨煙。<sup>40</sup>

對未來充滿憂懼，描述的氛圍也是冷峻的，可見她對當時處境的認知。同年，李元鼎的友人熊文舉（1595-1668）亦奉召入京，熊文舉的妻子杜漪蘭（1621-1681）與朱中楣友好，兩人有過同病相憐的互動，朱中楣曾對之寫下：「長安濤甚廣陵濤，誰謂山人索價高」、「仍憐時事等滄桑」，<sup>41</sup>以自然景物的波濤萬變比喻北京官場，而且官場的驚濤駭浪更甚。

李元鼎二次出仕期間，朱中楣的思歸之情更加深切。<sup>42</sup>朱中楣對北京官場

兩驟至漫賦〉之間，推測約作於順治五年到順治八年間，參見〔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88-89。

<sup>39</sup> 〔清〕朱中楣，〈歲晚寄意〉，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88-89。作於順治五年到順治八年間。

<sup>40</sup> 〔清〕朱中楣，〈辛卯五月隨梅君北上，夜泊橋頭，風雨驟至漫賦〉，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89。

<sup>41</sup> 〔清〕朱中楣，〈辛卯長至日得漪蘭熊年嫂白門見懷詩四首，依韻答之·其二〉、〈辛卯長至日得漪蘭熊年嫂白門見懷詩四首，依韻答之·其三〉，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89。

<sup>42</sup> 如順治九年寫的〈壬辰春偶觀同鄉康小范年家媪寄外詩詞，清新俊逸，想見其人，因漫屬和以志同聲〉、〈三月廿八日同金司馬龔奉常兩夫人往觀東岳盛會，是日立夏〉、〈壬辰七夕〉，見〔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

的憂懼果然不久便成真，順治十年李元鼎受到總兵任珍案牽連，一度論絞，<sup>43</sup>當李元鼎有性命之憂時，朱中楣打定主意，倘若夫死，便投井殉夫，<sup>44</sup>此與明末元鼎本欲隨李邦華殉國時的決定並無二致。同年，李元鼎脫罪後便舉家出京。由朱中楣順治九年（1652）和順治十年的作品中，可以見心境上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作於順治九年的〈春歸記夢〉云：

輕風吹夢繞天涯，夢到家園事事差。  
幸有殘書窺脈望，還餘勺水流銅牙。  
彈碁漫效今時局，問月空憐舊種花。  
春夢一場還是夢，春歸猶自滯冰衙。<sup>45</sup>

以夢到家園為起始，中寫對時局的感嘆，結尾兩句力度最強，無論她能在夢中回到家園幾次，終究是一場夢，醒時的失望與落寞使思歸之人更加痛苦，而這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因丈夫還被束縛在官場之中。朱中楣用「冰衙」具體形容她對宦途的感受，冰冷而無情，與同年中秋節所寫的「亂後餘生未有涯，幾從薄宦滯京華」，<sup>46</sup>是相似的看法，「薄宦」可見她對這份官位並不看重。「冰衙」、「薄宦」這類對官場的負面書寫在崇禎年間不曾出現過，從中十分隱曲地反映了朱中楣對朝代更迭的認同取向。

李元鼎一家於順治十年五月離開北京，<sup>47</sup>其時朱中楣的心境可說是豁然開朗，與前此的抑鬱大有不同。試看〈癸巳三春後試筆時將出都二首·其二〉：

入山猶未晚，解組一身輕。家釀堪同醉，團圓羨此行。<sup>48</sup>

頁 89-90。皆寫及思想之語，如「故鄉新月吐，應照掌珠圓」、「共作春明客，居然似故鄉」、「西風又度悲秋客」。

<sup>43</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 79，〈貳臣傳乙·李元鼎傳〉，頁 6601。任珍案詳情亦可參見周遠廉，《順治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 350-357。

<sup>44</sup>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 23，〈祭乳母文〉，頁 802。

<sup>45</sup> [清]朱中楣，〈春歸記夢〉，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90。

<sup>46</sup> [清]朱中楣，〈壬辰中秋前三日長安寄懷熊姑母〉，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91。

<sup>47</sup> [清]朱中楣，〈遊天主堂，并序〉，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91。序言：「癸巳五月將出都門。」

<sup>48</sup> [清]朱中楣，〈癸巳三春後始試筆時將出都二首〉，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91。

此時她的心情是「一身輕」，並且表示雖然滯留北方多年，但現在回鄉隱居也還不晚，欣喜放鬆之情與前此的憂懼驚怖呈現強烈對比。不過順治十年出京後，他們仍居住於寶應縣薨社湖，順治十四年冬天才舉家返回南昌定居。這年朱中楣以〈丁酉小春抵里〉記錄她日思夜想的返鄉之夢終為真實的一刻：

睽越鄉關十六年，今朝仍覩舊山川。

何期久滯淮南客，載得清風一擢旋。<sup>49</sup>

分析朱中楣的作品可以發現，相較於大量思歸之情的書寫，懷念故國或亡國之悲的寫作較少，兩者比例頗為懸殊，令人玩味。如今我們很難追問朱中楣是受限於其宗室身分而不敢多有表露，或有另有原因，但從這個現象可以推斷，牽涉故國此一主題時，朱中楣下筆十分小心，不能如思歸主題一般振筆疾書。或因謹慎，朱中楣常將她的故國之思隱藏在思鄉之情當中，委婉表露心跡。今人鄧紅梅研究女性詞時亦指出朱中楣經歷變代易姓，詞風成了念舊傷今、哀悼故國的嘆唱，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故家」印象，成了她詞作中傷心、多淚的出發點與歸宿地。<sup>50</sup>

作於順治初年的〈題燕〉，在尋常題目中暗藏黍離之思：「巢尋舊宇悲前代，粒補新雛慰晚飢。」<sup>51</sup>以尋找歸巢的燕鳥比喻亡國的自己，後寫對雛鳥的哺育，或許表示兒子是她活著的慰藉。約寫於順治二年的〈孟春感懷〉與〈孟冬感懷〉則在歸思中寄語家國之傷：

每聞羌笛動歎歎，淚染重衫思故廬。

苑柳含芽眉未展，山茶抱節葉難舒。

春風野草愁兼長，夜月征鴻信亦疎。

為憶當年蘇武句，自憐何日整歸車。<sup>52</sup>（〈孟春感懷〉）

<sup>49</sup> [清]朱中楣，〈丁酉小春抵里〉，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續編》，卷17，頁111。

<sup>50</sup> 鄧紅梅，《女性詞史》，頁240-241。

<sup>51</sup> [清]朱中楣，〈題燕〉，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5。該卷還收有〈丁亥元日試筆〉（頁86），可知〈題燕〉應作於順治四年以前，且依據排序，可能順治元年就寫此作。

<sup>52</sup> [清]朱中楣，〈孟春感懷〉，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5。約作於順治二年。

為客他鄉已六年，幾經滄海變桑田。  
清霜凜凜凋殘葉，澹月溶溶罩晚煙。  
怨逐漏聲悲漢闕，愁隨夢影到吳川。

白雲歸盡人千里，悵望關河淚黯然。<sup>53</sup>（〈孟冬感懷〉）

在愁苦的鄉思中兼含有對前代的傷歎。順治四年（1647）的〈丁亥元日試筆〉：「山川如舊冠裳改，城北城南起暮茄。」<sup>54</sup>則在描寫新年時語及山川如舊，然冠裳已改，指清朝薙髮易服事，僅點到為止，但其心中的故國之思可想而知。一向十分重視兒子教育的朱中楣，此時曾偶發「世亂教兒懶」的情緒，<sup>55</sup>與其他課子讀書的作品頗不相類，含有她對時局的嗟歎，甚至是不滿。

〈浪淘沙·雨中感懷〉表達了對世事的叩問：

家信杳然何處覓，且待新鴻。睽越此情同，歸念匆匆。濕雲迢遞鎖明宮，為問滄桑無限事，今已三逢。<sup>56</sup>

以鳥寄予心切的鄉思，明宮深鎖應暗指明亡一事，其中今已三逢的「滄桑無限事」，依據李振裕的紀錄，應是指1644年目睹李自成攻陷京師、清兵逐李自成而代之以及順治五年金聲桓與王得仁江西起兵反清事。<sup>57</sup>順治九年，李元鼎二度出仕清朝的期間，朱中楣寫過：「二十四番花信後，天時人事總堪嗟。」<sup>58</sup>人事指自身，天時便暗指了更大的家國。

在朱中楣的作品中，最為明顯提及黍離之傷的作品，是這首約作於順治十四年的〈春日感懷〉：

青春作伴已還鄉，贏得新詩富草堂。

<sup>53</sup> [清]朱中楣〈孟冬感懷〉，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6。

<sup>54</sup> [清]朱中楣，〈丁亥元日試筆〉，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6。丁亥年即順治四年。

<sup>55</sup> [清]朱中楣，〈梅君避暑山寺寄答〉，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88。約作於順治四年或順治五年。

<sup>56</sup> [清]朱中楣，〈浪淘沙·雨中感懷〉，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15，頁97。

<sup>57</sup> 李振裕，《白石山房文集》，卷25，〈顯妣朱淑人行述〉，頁821。

<sup>58</sup> [清]朱中楣，〈春日即事〉，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14，頁90。

蘇圃漫天湖水綠，紫桑難問徑花黃。  
 荒城處處傷離黍，舊燕飛飛覓畫梁。  
 家國可堪寥落甚，怡情何地足滄浪。<sup>59</sup>

此詩作於朱中楣與李元鼎一同返回南昌定居後，心情較為放鬆愉悅，但首四句的歡愉之情持續不久，就一轉為今昔已非的傷痛，所有舊時熟悉的事物都能引起她年少時期的回憶，也就是那段國破家亡前的單純日子。順治十四年夏天，朱中楣因讀友人徐燦（1617-?）的作品，深有感觸，提筆寫下兩首和詞〈滿江紅·丁酉仲夏讀陳素庵夫人詞感和〉：

淚眼愁懷，聊只把，芳詞翻閱。句清新，堪齊絡緯，並稱雙絕。字字香傳今古憤，行行畫破英雄策。倩玉簫，吹徹漢宮，秋聲咽。離別悶，仍糾結，舊遊處，燕臺月。恨一番風雨，亂紅愁疊，羨玉樹森森連紫苑，英才盡是人中傑。盼相逢，約略在何年，從頭說。（〈其一〉）  
 乍雨還晴，怨怨怨，天無分別。更那堪，淮流涇水，共人悲咽。佳節每從愁裏過，清光又向雲中沒。怪啼痕，欲續調難成，柔腸絕。花弄影，紅殘纈，冰荷覆，瑤琴歇。問樑間燕子，共誰淒切，舉目關河空拭淚，傷心杯酒空邀月。歎人生，如夢許多般，皆虛擲。（〈其二〉）<sup>60</sup>

徐燦「故國之思」的深厚纏綿，確為一般詞人所不能及，正是這「故國之思」觸動了她。<sup>61</sup>朱中楣讀到淚流滿面，因她們同樣擁有深切的亡國之痛，<sup>62</sup>盛讚

<sup>59</sup> [清]朱中楣，〈春日感懷〉，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續編》，卷17，頁111。其前兩首即〈丁酉小春抵里〉。

<sup>60</sup> [清]朱中楣，〈滿江紅·丁酉仲夏讀陳素庵夫人詞感和兩首〉，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15，頁101。丁酉即順治十四年。

<sup>61</sup> 鄧紅梅，《女性詞史》，頁240-241。

<sup>62</sup> 徐燦作品中具有濃厚的亡國哀音，下筆跌宕沈雄不遜於男子，為女性詞史上的重要標竿。徐燦的研究可見孫康宜撰，謝樹寬譯，〈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22:6(1993)，頁8-25；補正更改後以篇名〈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柳是和徐燦的比較〉，收入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頁110-133。鮑家麟，〈明末清初的蘇州才女徐燦〉，收入《中國婦女史論集》，集5（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213-214。陳邦炎，〈評介女詞人徐燦及其拙政園詞〉，收入葉嘉瑩、陳邦炎，《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頁1-29。關於朱中楣與徐燦這兩位境遇相似的才女之比較，可參見拙作〈鄉國半愁烟：明清鼎革與徐燦、朱中楣的家國書寫〉。

徐燦之筆「字字香傳今古憤，行行畫破英雄策」，她的和詞雖仍不脫柔婉，但之中的斷腸愁恨，足見即使李元鼎已如她所願離開清朝官場，她的亡國遺恨依然存在。

朱中楣生前最後一部著作《亦園嗣響》，<sup>63</sup>內有一首郊遊之作〈滿庭芳·花朝偕陳浣花君朱女琴士讌集熊姑母東湖草堂，隨過杏花邨第，風雨驟作而歸，因訂尼菴之約〉，其中上闕雖寫出遊過程，下闕卻一轉為故國之傷：

閑評傷往事，王孫草綠，帝女花芬。漸苔侵蔣徑，蒿滿張門。賸有方池碧漲，凝眸處，樹古亭新。還堪嘆，驚雷迅作，風雨杏花邨。<sup>64</sup>

「傷往事」應即指亡國之痛，昔日花草嫩芳的杏花村而今已荒敗如斯，撥動著她心中的黍離之思。朱中楣專注凝視的「樹古亭新」，隱喻興亡之感，江山依舊，朝代卻已經易主。表面上寫堪嘆驚雷驟至讓杏花村陷入風雨，實暗指推倒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如驚雷風雨的甲申之變。

綜上所述，可見朱中楣對故國的書寫甚是婉曲，很少直接寫就，多隱藏在其他題目下幽微透露。雖然數量比思歸之作少了許多，但時間的跨距很長，由鼎革之際，直到如願歸隱後都持續表露，顯示亡國之痛雖然不是身為宗室女的她敢於大量寫作和發揮的題材，但自始至終都存在於她的心中。

### 三、關於出處抉擇的夫妻互動

清人陳鼎（1650-？）寫有一篇朱中楣的小傳，收於《留溪外傳·閩德部》，以讚美其德行，文中直指朱中楣對於李元鼎出仕清朝一事十分沮喪，甚至不願隨行：

既而我朝定鼎，起用前朝諸臣。元鼎應詔出，中楣沮之不得，乃贈之

<sup>63</sup> 《石園全集》第十七卷的《隨草續編》約收順治十三年到順治十七年，或十八年的詩作。第十八卷的《亦園嗣響》則收順治晚年到康熙初年間的詩詞，其中朱徽的序作於康熙八年，李振裕之跋作於康熙七年，而朱中楣亡於康熙十一年，《亦園嗣響》為朱中楣最後一部著作當無疑，也是唯一有收錄到康熙年間作品的集子。

<sup>64</sup> [清]朱中楣，〈滿庭芳·花朝偕陳浣花君朱女琴士讌集熊姑母東湖草堂，隨過杏花邨第，風雨驟作而歸，因訂尼菴之約〉，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亦園嗣響》，卷18，頁121。



以詩曰：「妾身自是裙釵女，羞把蛾眉別画人。」不欲偕行，願獨處山中繫纜課子。及元鼎拜少司馬，誥封中楣夫人，然中楣甘荊布，不事濃華，惟朝夕吟詠自娛而已。<sup>65</sup>

可惜陳鼎所引用的詩句，今本朱中楣詩集中已不存，無法窺見全貌，也難考陳鼎於何處得知。由於陳鼎約生於順治七年（1650），<sup>66</sup>與李元鼎、朱中楣時代相當接近，亦不排除有口語流傳的可能。假若該詩為真，可能是遺失或於收錄詩集時被刪除。李元鼎出仕清朝時仍處戰亂動盪之時，作品不易保留也屬平常，此外，「羞把蛾眉別画人」一句與現存的朱中楣作品相較，諷刺意味頗為明顯，若非遺失而是有意刪除，其動機就頗耐人尋味。即使詩句為訛傳，這則記載也有其價值，它顯示了在時人眼中，朱中楣的態度確實雅不願丈夫出仕清朝，而此一態度也與朱中楣的其他作品相吻合。

實際上，李元鼎雖降清，但他並非十分安心地任官，順治二年元旦寫下的〈乙酉元旦試筆〉，甫新官上任的李元鼎，卻似乎沒有鴻圖大展的喜悅或盼望。<sup>67</sup>收到丈夫報平安的消息，朱中楣也寫了一首和詩，以「新客」和「舊官」對比，可一窺朱中楣幽微的今昔之感：

吹徹鐘聲柳色寒，氤氳佳氣報平安。

檐前鸚鵡傳新客，殿內威儀感舊官。<sup>68</sup>

朱中楣不僅呼應李元鼎的夫妻之情，更對「歸思」表達全然的認同與肯定。不久朱中楣又寫下「忽驚遠市吹羌笛，還記深宮奏夏簧」、「明朝又值新秋節，且放閒愁對羽觴」，<sup>69</sup>以羌笛和深宮樂音委婉的表達了她的故國之痛；李元鼎

<sup>65</sup> [清]陳鼎，《留溪外傳》（濟南：齊魯書社，1996），卷16，〈遠山夫人傳〉，頁770。

<sup>66</sup> 丘文豪，〈清初忠君觀——以陳鼎《留溪外傳》為例〉，《歷史教育》，19（2012），頁166。

<sup>67</sup> [清]朱中楣，〈乙酉元旦試筆〉，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0。全詩為：「斗柄初回氣不寒，依然春色在長安。未須節物驚時代，仍有威儀列漢官。萬里鄉關空悵望，天涯妻子且團圓。歸思欲問桐江水，擬把嚴陵一釣竿。」

<sup>68</sup> [清]朱中楣，〈和乙酉元旦試筆〉，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1。

<sup>69</sup> [清]朱中楣，〈七夕次日立秋〉，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1。依據前後的詩作標明的時間，此作應作於順治二年到

所和的「漫說江東蓴膾美，清宵相對且浮觴」，<sup>70</sup>也可見其思歸之情。這兩組唱和詩的寫作時間早在順治二年到三年間，可見夫妻二人在去留上同調的時間點甚早。

李元鼎任官未久，順治四年（1647）四月已遭革職，這是李元鼎在清朝的第一次離開官場，遭此難時，朱中楣先行離開北京，途中寫了向丈夫報平安的〈出都寓津門候梅君不至偶成卻寄二首〉，云：

漫論往事如碁局，莫向臨期憶釣竿。

雁聲遠度關河冷，早策歸鞭歲欲闌。<sup>71</sup>（〈其一〉）

濃霜凜凜侵裘薄，倦馬蹒跚怯路難。<sup>72</sup>（〈其二〉）

表達關心之餘，更充滿了「望君早歸」、勿再蹉跎的心思。李元鼎當時也已離開北京，正在前往與朱中楣會合途中，展信閱畢，他亦深知妻子之意，答以「只合東山可臥安」、「歸飛倦鳥意先闌」<sup>73</sup>，頗為呼應。

儘管因江西戰事未能儘速返鄉，朱中楣仍對於李元鼎離開官場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如順治五年時寫的：「飄泊漫欣曾解帶，逍遙唯喜早抽簪」，暗喻不如早歸，並直言希望歸隱的態度：「偕隱宜從翰墨圃，同遊直到買山庵。」<sup>74</sup>更說：「十一年來滯帝鄉，幾番愁思度春光」，嘆問「海燕何時穩畫梁」，<sup>75</sup>表露

三年間。

<sup>70</sup> [清]朱中楣，〈和七夕次日立秋〉，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1。

<sup>71</sup> [清]朱中楣，〈出都寓津門候梅君不至偶成卻寄二首·其一〉，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2。

<sup>72</sup> [清]朱中楣，〈出都寓津門候梅君不至偶成卻寄二首·其二〉，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2。

<sup>73</sup> [清]李元鼎，〈出都至務關，得內人寄來素紉二詩，依韻和之·其一〉，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2。

<sup>74</sup> [清]朱中楣，〈和五日自潞河歸津門二十韻〉，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4。下一首詩題為〈己丑元日試筆時客潞灣〉，推測此作應作於順治五年。

<sup>75</sup> [清]朱中楣，〈和舟發津門〉，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4-75。全詩為：「十一年來滯帝鄉，幾番愁思度春光。歸帆漫逐桃花水，卜築還營固本塘（用李吉甫淮南事）。岸岸垂楊侵客袂，邨邨斷井感人腸。蓬窗共對閒烹茗，海燕何時穩畫梁。」李元鼎原詩〈舟發津門〉：「鶯花撩亂伴還鄉，鼓角猶生客路光。三徑未能營鑑曲（吉水），一枝高擬寄雷塘（揚州）。十年

惟有回鄉才能得到安穩的意念。

李元鼎也深知妻子心意，對於不能達成其願亦頗自責，而朱中楣雖歸心似箭，但仍維持溫婉的態度，兩人互相理解與體諒，彼此勸勉、扶持，夫妻情感可謂「應照兩心同」。<sup>76</sup>順治六年（1649）夫妻兩人在元旦時有過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的對話：

十年每負還家約，百里空傳去國情。

客舍有懷堪夢燕，上林何樹可遷鶯。<sup>77</sup>（李元鼎）

連宵共話他鄉夢，幾載空懷故國情。

庭樹春回堪舞鳳，林花日暖待鳴鶯。<sup>78</sup>（朱中楣）

朱中楣詩中不僅含有對故國與家鄉的思念，且對返鄉心願仍抱希望，這也是她為數不多直接使用「故國」一詞的作品。

不過官場的變化總是難以預料，進退皆同，滿心以為只需等戰火平息便能返鄉的朱中楣再次失望了，無怪乎她時有「人歸不似春歸易」的感嘆。<sup>79</sup>順治八年八月李元鼎得召，命回京復任原官。<sup>80</sup>這次進京的舟行旅途中，朱中楣主動向李元鼎索取一首題扇詩，再加上自己的和詩，留下兩首各十二聯的長篇律詩〈辛卯季夏赴召北上舟次清源內子持扇索書〉。<sup>81</sup>朱中楣索題扇詩的

飄泊難回首，萬里煙波豈斷腸。岸影頻移春欲盡，不堪釀酒對河梁。」（《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 11，頁 74。）依作品時間排序，此組唱和詩約作於順治六年。

<sup>76</sup> [清]朱中楣，〈七夕同梅君小飲〉，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下》，卷 14，頁 88。此詩作於順治五年到八年之間。

<sup>77</sup> [清]李元鼎，〈己丑元日試筆（時客潞灣）〉，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 11，頁 74。

<sup>78</sup> [清]朱中楣，〈和己丑元日試筆（時客潞灣）〉，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 11，頁 74。

<sup>79</sup> [清]朱中楣，〈千秋歲·春雪〉，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 15，頁 100。

<sup>80</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 79，〈貳臣傳乙·李元鼎傳〉，頁 6601。

<sup>81</sup> [清]李元鼎，〈辛卯季夏赴召北上舟次清源內子持扇索書〉，收入 [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下》，卷 12，頁 75。全詩為：「偕隱誠堪老鹿門，江湖何事拜君恩。扁舟泛泛攜兒女，三徑荒荒笑鶴猿。幸有同心欣舉案，每當好景一開尊。卷簾頻納青山色，擊楫還驚白水痕。對語未能嫺世務，箋詩何必譜名媛。奇雲變幻林光薄，佳月圓虧浪影翻。或共推窗驅暑溽，有時酌茗浣襟煩。宵因柝靜知安阜，險歷河流怖激奔。雨過邨臯籬黍麥，煙清野澗散雞豚。帝鄉咫尺殊風物，故

舉動頗耐人尋味，由組詩內容可看出題扇詩僅是一個有形的媒介，朱中楣真正想要的其實是丈夫何以再出仕的說法或解釋。或許夫妻二人私下曾有過討論，但已無法確知，只能由這兩首詩中探尋蛛絲馬跡。

李元鼎大約知道妻子索詩之舉背後的真意，開篇便言「偕隱誠堪老鹿門，江湖何事拜君恩」，但這一自問並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僅是於詩中自嘲自己不能貫徹離開仕途歸隱的行為，說「扁舟泛泛攜兒女，三徑荒荒笑鶴猿」，反落得遭鶴鳥猿猴嘲笑的處境。但慶幸自己有賢妻相伴，「幸有同心欣舉案，每當好景一開尊」，認為妻子能與己同心。詩末又言：

帝鄉咫尺殊風物，故國依稀繞夢魂。

矢報自慙雙鬢短，對揚恃有一心存。

表示自己沒有忘記故國與故鄉的心情，似有自我辯解的意味。而這份心意是「此意非卿孰與論」，除了朱中楣，不足為外人道也。其中雖含有十分看重朱中楣的深情，但詩中又未明言出仕的理由，似乎也有些一廂情願地認為朱中楣能夠理解他的難處。

朱中楣和詩的開頭亦是描寫他們當時的處境，「南歸欲覓舊柴門，何意彈冠赴特恩。三徑未成重理檝，千山遙憶隔啼猿」<sup>82</sup>，好不容易能夠歸鄉隱居，卻又失落的無奈心境。但或許為了回應李元鼎的「盼望」，朱中楣主動把丈夫沒有說清楚的解釋明朗化，說道：「知君自為蒼生出，從古惟聞綺皓存。」<sup>83</sup>出仕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為了造福蒼生，這樣的說法十分冠冕堂皇地替李元鼎開脫了尷尬的處境。然而我們卻不宜將之視為朱中楣「慫恿」李元鼎出仕，<sup>83</sup>

國依稀繞夢魂。矢報自慙雙鬢短，對揚恃有一心存。新秋漸近炎威戢，此意非卿孰與論。」

<sup>82</sup> [清]朱中楣，〈和辛卯季夏赴召北上舟次清源內子持扇索書〉，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下》，卷12，頁75-76。全詩為：「南歸欲覓舊柴門，何意彈冠赴特恩。三徑未成重理檝，千山遙憶隔啼猿。香侵蓼國飄紅粉，露滴荷房瀉綠尊。遠岸菁蔥連雨足，閒鷗飛泛點秋痕。朝廷有道思良弼，彤管承家媿昔媛。新月含輝雲外吐，斜峰倒影浪中翻。偶來墜葉驚詩思，厭聽嚴更攪夢煩。晚泊邨宵雞喔喔，平原戍獵鹿奔奔。天涯蓬轉隨征雁，澤畔桑深臥野豚。銀漢乍迴青鵲羽，金風漸返木犀魂。知君自為蒼生出，從古惟聞綺皓存。把酒漫同兒女醉，頻年憂患不須論。」

<sup>83</sup> 劉麗認為李元鼎的出仕與朱中楣的慫恿有關，見於劉麗，〈甲申之際明朝士人心態與選擇〉，《北方論叢》，2009：1（2009），頁87。劉麗對於李元鼎與朱中楣的兩組唱

這是沒有經過對朱中楣的研究所下的輕率推斷。據本文對朱中楣作品的耙梳，可知名亡後她最大的心願就是返鄉歸隱，常為此憂愁難解。這樣的她在此替丈夫作出如此「正當」的開解，並非出於真心盼望丈夫再次為官有所作為，反而恰好反映了她的無奈處境以及傳統婦德的體現。此詩寫作的時間點是在北上京城的舟行之中，李元鼎再次出仕已是必然，否則根本無此行之必要。在旅途中，朱中楣主動索題扇詩求解，卻得到丈夫含糊模稜的答覆，依照傳統婦德對妻子的要求，朱中楣很難做到在和詩中與丈夫針鋒相對或咄咄逼人，當此處境，她選擇替丈夫曲意開解，其中實有無奈苦澀的複雜情緒，詩末「把酒漫同兒女醉，頻年憂患不須論」，大有藉酒消憂之態。

朱中楣用憶鄉、思歸表達不希望丈夫出仕的真心，尤以〈長相思·思歸〉這組唱和詞的書寫最為明顯。依作品收錄時序推斷，〈長相思·思歸〉應是作於順治八年後再次出仕的這段時期。朱中楣於李元鼎第二次出仕時，出現此番較為明顯的追問，一定程度反映了朱中楣對清朝官場的認知又深了一層，她感受到宦海禍福難測，進與退往往不能操之在己，並對此深懷憂慮恐懼，凡此種種皆加深了她的思歸之念：

憶家山，盼家山，世亂紛紛求退難。羅衣淚染斑。

昔為官，又為官，甚日歸兮把釣竿？空看楓葉丹。(朱中楣)

望雲山，過雲山，身似羝羊進退難。青衫淚點斑。

說辭官，又之官，林下何人把釣竿？負他雙岫丹。(李元鼎)<sup>84</sup>

這首詞是朱中楣現存作品中寫過對李元鼎最為直截了當的探問，直問李元鼎兩次出仕一事，暗示丈夫不能堅持歸隱，微帶諷刺，並忍不住追問究竟何時才能歸去？「空看楓葉」也反映她一再失望後不敢懷抱期待的心情，深怕歸夢又是一場空。這首詞雖飽含失望與不滿，但語氣仍不失幽婉平和。李元鼎的回應則是他也盼望家鄉，但自己實是進退皆難，慚愧自己一再有負所約。

順治十年李元鼎因任珍案罷官離京，暫僑居寶應。他在順治十二年(1655)

---

和詩〈有客〉及〈辛卯季夏赴召北上舟次清源內子持扇索書〉的解釋多所曲誤，偏離朱中楣本意甚鉅。

<sup>84</sup> [清]朱中楣，〈長相思·思歸〉，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15，頁94；[清]李元鼎，〈長相思·和思歸〉，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15，頁94。

秋天憶及當年，還有餘悸猶存之慨：

癸巳之夏，攜家南還，患難之餘，此身飄泊，幾同蓬吹寧獨舟，如斷梗泛泛，若水中之梟哉。蓬窗臥疴，筆研幾欲焚棄，內人每拈題送韻，不為交謫之言，多有開愁之句。古人云：「休官不謀之妻子。」豈其然乎！日久途長，駸駸成帙，因取從前唱酬諸詩，選付鈔棗，見十餘年懷抱之惡不至抑鬱委頓者，得此慰藉良深耳。夫冀缺躬耕，負馱相敬，鹿門偕隱，矢志同歸，古今猶豔稱之，而況余兩人之于喁自適，金石相宣，即言之無文不暇計矣，但余職倡而詩多屬和，亦以見愁思要眇，書空咄咄之大槩，良足三歎云爾。<sup>85</sup>

回憶這些年的患難，他的感受是飄泊無依，又多病痛，身心皆是煎熬，幸賴朱中楣與他的唱和及分憂解愁，方得撐過。最後終能與朱中楣偕隱南歸，矢志同歸之情至篤。其實當時李元鼎仍僑居寶應，其所謂南還當指相對於北上京城而言，真正舉家遷返家鄉江西南昌定居是在順治十四年冬天。故朱中楣在順治十三年元旦寫給李元鼎的詩提到「共擇南枝穩，安宜即似鄉」。<sup>86</sup>

順治十四年冬天，李元鼎為兒子娶親，終於攜家返回南昌。李元鼎以飄泊無依描述離開的心情，稱：「憶昔驅車出京洛，荒荒白日浮雲薄。蕭然泛宅如飄蓬，四海一身無處著。偶過涇河暫卜居，三里之城七里郭」。<sup>87</sup>李元鼎的茫然感與妻子的心境頗不相同，相較之下朱中楣是抱持比較正面的態度，她認為雖未能更早脫身，但終能得歸已是大幸：

幾年偕隱同歸洛，紛紛世態春冰薄。  
今古長安似弈碁，唯有投閒是先著。  
隋堤舊院冷鞦韆，譙國新旌綴珠絡。  
海棠無力怯春寒，夢破春愁愁滿橐。

<sup>85</sup> [清]朱中楣，〈倡和初集序〉，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唱和初集上》，卷11，頁70。癸巳即順治十年。

<sup>86</sup> [清]朱中楣，〈丙申元旦試筆并寄梅君〉，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續編》，卷17，頁109。

<sup>87</sup> [清]李元鼎，〈戊戌春和上浣日雪翁熊少宰以和山谷梅花韻見投走筆屬和二首·其二〉，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鏡閣新聲》，卷16，頁104-105。

寄語猿鶴莫漫猜，而今始踐山林約。<sup>88</sup>

明確表達不願再參與宦途這場「棋局」，惟有歸隱山林才是最好的選擇。更隱隱流露朝代興亡的今昔之感，暗示亡國後自己的滿滿愁情。「寄語猿鶴莫漫猜，而今始踐山林約」，可見早欲歸隱山林的念頭，經過苦苦等候，願望終能實現的喜悅。

朱中楣晚年的作品中幾乎不再提及與丈夫一同經歷的宦途過往，寫於康熙年間的〈連理枝·遣興〉是少數談及仕宦的晚年之作，且正可作為她回顧人生的自我註解，其中的安穩恬靜與歸隱前的書寫筆調大有不同：

不效遊仙去，且向塵中住。半構新軒，舊園名石，足成佳趣。看芙蓉  
隔岸，錦屏開，勝湖山雲樹。

往也何須慕，今也何須驚。幸識投林，傍觀宦海，容誰道故。賦歸來  
釀酒，有黃花，與高人警悟。<sup>89</sup>

能夠離開京城，丈夫不必再身涉宦海，歸隱家鄉，終讓她得到寧靜。朱中楣與李元鼎在歸隱問題上有頗多心境相類之處，雖然李元鼎的歸隱心意不如朱中楣迫切與堅定，但他最終仍是完成了朱中楣的心願。

然而，對於兒子李振裕的出仕，朱中楣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順治十七年，李振裕鄉試合格，取得舉人身分，同年十二月，李振裕北上赴考會試。<sup>90</sup>朱中楣藉詩詞表達對兒子的期望，〈示兒公車北上〉云：

吾門事業始唐開，繼世天教付汝才。  
已喜故園新折桂，行看上苑早探梅。  
家傳經史精研索，策對軒墀謹體裁。

<sup>88</sup> [清]朱中楣，〈和戊戌春和上浣日雪翁熊少宰以和山谷梅花韻見投走筆屬和〉，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鏡閣新聲》，卷16，頁105。

<sup>89</sup> [清]朱中楣，〈連理枝·遣興〉，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亦園嗣響》，卷18，頁120。

<sup>90</sup>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卷24，〈成服告大人文〉，頁808。載：「丁酉，府君為孤納娶，遂偕母大人同還南昌卜居焉。三年，孤倖舉於鄉。府君命孤曰：『爾此身屬君，須精白乃心，以無負家訓。』孤跪受惟謹。時當計偕入都，府君以孤幼也，不忍離，遂挈孤同抵淮上，渡河看孤登車，延佇良久始回。白田度歲，不孝孤之違府君膝下，自茲始矣。」

驛路風霜當自攝，春深應報錦衣迴。<sup>91</sup>

相較於詩以較為嚴肅的筆調書寫，詞中則流露出更明顯的情感，〈法駕導引·兒裕公車北上，梅君送至秦淮，時值嚴冬，喜南風大作，偶成此調〉：

君亦去，君亦去，離思付重拈。憶到金陵花正發，愁吟詩句淚頻添，  
多因誤失占。(〈其一〉)

欣風動，欣風動，吹送孝廉船。此日清霜欺客袂，來春紅杏簇朝鞭，  
佇盼錦標旋。(〈其二〉)<sup>92</sup>

李振裕出發時正值冬季，通常吹北風，北上舟行需逆風而駛，船速較慢，也多風波。偶然的南風大作，夫婦倆也都認為是吉兆。身為前明宗室，朱中楣心態上對新朝是疏離冷峻的，但對士人來說，仕宦乃人生職志，為人母的朱中楣也希望兒子在這條必經之路上走得順遂。詞中仍滿懷對兒子上榜的期待，來春紅杏句表面寫景，實則寓意期盼明年春闈能夠高中進士。

由此顯見她對丈夫和兒子出仕清朝的態度大有差別，對李元鼎，她始終是抱持著「不如早歸」的心志，但對兒子出仕則是全力支持、期許甚高。筆者以為，這種懸殊的態度反映了朱中楣認為父子兩人的身分有別，李元鼎曾受明朝俸祿，為故國之臣，與明清易鼎之時年僅兩、三歲，並成長於清朝的李振裕不同。生為家族的男性，讀書、科考、仕宦是必經之路，若無人出仕，家族必走向沒落。生計問題首當其衝，<sup>93</sup>學者何冠彪便指出生計困難及清廷威迫利誘，就推使一些遺民加入科舉行列，他們未必「慕功名」，而是求「保

<sup>91</sup> [清]朱中楣，〈示兒公車北上〉，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鏡閣新聲》，卷16，頁108。

<sup>92</sup> [清]朱中楣，〈法駕導引·兒裕公車北上，梅君送至秦淮，時值嚴冬，喜南風大作，偶成此調〉，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15，頁93。李元鼎有言：「頻頻吉兆占。」參見[清]李元鼎，〈和法駕導引〉，收入[清]朱中楣、[清]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詩餘》，卷15，頁93。

<sup>93</sup> 參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88-304，指出「謀生」這一極現實的課題，攪動的士人思想的隱微之處，出現相當多「業」的討論，他們對職業評估的思想邏輯值得玩味。孔定芳，〈論明遺民之生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4（2012），頁37-49，指出從理論上來說，明遺民既然選擇了不與新朝合作的「體制外」生存方式，其生計困頓幾乎是必然。從事實上來看，明遺民雖或課讀書館，或躬耕自食，也有少數人從事游幕或其他「雜業」，但整體而言，明遺民的貧窮困厄卻是一個客觀事實。



身家」。有些遺民雖然堅持不出，但為了保護身家，仍派子弟出試及出仕，才能維持生計，保障他們不失節，如明遺民顧炎武（1613-1682）的甥姪、黃宗羲（1610-1695）之子、呂留良（1629-1683）之子、王夫之（1619-1692）的兒孫皆出仕清朝，明遺民的子孫實不可能永遠與清政府隔離。<sup>94</sup>明遺民為了生存，即便自己不出仕，也讓家族子弟赴考。朱中楣基於家族的存續，亦沒有理由反對李振裕出試，這點與她在甲申之變時以家族存亡說服李元鼎勿死的態度一致。況且朱中楣既然不希望李元鼎仕清，則投入仕途延續家族命脈的責任必然交到下一代手上，也充分顯現易代之際士人所必然面臨的家族存續問題。

## 結語

明清易鼎深深影響了當時士人的心理與生活，而向來被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的女性，在這場變革中雖不能作為救亡的實踐者或行動者，卻與男性士人一樣是這場變局中真實的經歷者，她們的經驗也是明清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明朝的滅亡在朱中楣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創傷，可見世變的政治風暴也同樣深深影響著閨閣內的女性，即便當時她們沒有政治上的任何權力，但這不表示她們的易代經驗無足輕重，更不意謂她們就沒有家國之痛。考察朱中楣身處鼎革世變之時，始終比其夫擁有更堅定的歸隱心志，其明亡後的思鄉書寫比崇禎年間更為強烈、反覆、密集，其中的幽微愁苦都暗暗指向朱明王朝的傾覆。

朱中楣不斷書寫的懷鄉文字，不僅是情感與心志的抒發，也為她的生存處境留下見證。朱中楣常寫身不由己的無可奈何，不免令人感受到丈夫出仕也是身不由己的「開解」，雖姿態較「柔順」，對於丈夫仕清的觀感和黍離之

---

<sup>94</sup> 何冠彪，〈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收入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頁125-167。孔定芳亦指出康熙十七年詔舉的「博學鴻儒科」，是顧炎武晚年「政治操守」的嚴峻考驗，經過「博學鴻儒科」的溫柔籠絡後，顧炎武對清王朝的態度亦有鬆動和軟化，詳見孔定芳，〈「博學鴻儒科」與晚年顧炎武〉，《學海》，2006：3（2006），頁49-53；至於康熙皇帝以「博學鴻儒科」籠絡遺民的策略、遺民態度的轉變及「遺民不世襲」等討論，可參見孔定芳，《清初遺民社會：滿漢異質文化整合視野下的歷史考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317-357。

悲書寫亦甚含蓄，但仍能從中挖掘出她的真心。朱中楣相當程度的藉「鄉」代「國」，用懷鄉思歸之筆潛伏亡國哀音，表面上寫早謀歸鄉，實則是希望丈夫離開仕途，「自有刀環約，何須滯上方」、「春歸猶自滯冰衙」即明白點出這層以「歸鄉」暗示「不仕」的真心。朱中楣的友人徐燦的作品中藉「鄉」代「國」的表達則更為明顯，且經常「鄉國並舉」，使「故鄉」和「故國」彼此互相指涉，其書寫的亡國哀音也比朱中楣更加強烈，故國思明主題作品的比例也遠比朱中楣高。筆者以為，朱中楣對亡國之痛的表達甚為含蓄，不似徐燦有力透紙背的跌宕沉雄之作，這一來出於朱氏始終不脫離傳統閨秀淑女的文風所限；二來出於她宗室的敏感身分，丈夫已在清朝為官，明顯書寫思明之悲也許會為他們夫妻招來政治風險，其含蓄內斂的書寫方式或為一種自保的因應之道。

朱中楣同時兼有宗室女及「貳臣」之妻的身分，具體呈現了鼎革時期的特殊性及複雜性，朱氏之處境以及其與李元鼎關於去留之討論，都是僅關注士人時不能觀察到的面向。儘管現實生活上朱中楣並不握有去留的決定權，也無法以具體行動表達對新朝的觀感，但通過書寫仍留下了她的聲音，由此可見知識女性思想情志主體性之一斑。

本文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收稿；2018 年 5 月 9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蕭琪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一) 史書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清〕清國史館，《欽定國史貳臣表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清〕陳鼎，《留溪外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122，濟南：齊魯書社，1996，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自刻本影印。

〔清〕鄂爾泰等奉敕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二) 文集、筆記等

〔清〕朱中楣，李元鼎，《石園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96，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雍正修版印本影印。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43，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清〕李振裕，《白石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43，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南京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香雪堂刻本影印。

〔清〕周銘編，《林下詞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7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年（1671）刻本影印。

〔清〕熊文舉，《侶鷗閣近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2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 (三) 地方志

〔清〕于成龍等修，〔清〕杜果、〔清〕陳名等纂，〔康熙〕《江西通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刻本影印。

〔清〕周樹槐等纂修，〔道光〕《吉水縣志》，收入《中華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 766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據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影印。

## 二、近人論著

- 孔定芳，〈「博學鴻儒科」與晚年顧炎武〉，《學海》，2006：3（2006），頁 49-53。
- 孔定芳，《清初遺民社會：滿漢異質文化整合視野下的歷史考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 孔定芳，〈論明遺民之生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4（2012），頁 37-49。
- 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食貨月刊復刊》，15：9、10（1986），頁 65-75。
- 王成勉，〈再論明末士人之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收入《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一）》，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 231-242。
-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12。
- 丘文豪，〈清初忠君觀——以陳鼎《留溪外傳》為例〉，《歷史教育》，19（2012），頁 163-183。
-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
- 李小榮，〈夫唱婦隨：明清過渡時期李元鼎和朱中楣夫妻的詩歌唱和〉，收入曹虹、蔣寅、張宏生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五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頁 144-160。
- 李惠儀，〈明清之際的女子詩詞與性別界限〉，收入方秀潔（Grace S. Fong）、魏愛蓮（Ellen Widner）編，《跨越閨門：明清女性作家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173-199。
- 周遠廉，《順治帝》，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

- 孫康宜撰，謝樹寬譯，〈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22：6（1993），頁 8-25。
- 曹 月，〈荒城處處傷離黍，舊燕飛飛覓畫梁——論朱中楣詩詞中的「家國之思」〉，《文教資料》，2013：29（2013），頁 46-48。
- 陳永明，〈乾隆《貳臣傳》立傳原則平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4（2013），頁 753-784。
- 陳邦炎，〈評介女詞人徐燦及其拙政園詞〉，收入葉嘉瑩、陳邦炎，《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頁 1-29。
- 陳逸雯，〈鄉國半愁烟：明清鼎革與徐燦、朱中楣的家國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 華 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 葉高樹，〈乾隆時代官修史書的教化功能——兼論乾隆皇帝統御漢人的策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1994），頁 171-199。
-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 趙 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趙宣竹，〈女詞人朱中楣《石園隨草詩餘》研究〉，《雲夢學刊》，36：4（2015），頁 112-118。
- 趙雪沛，〈清疏曠放的林下風致——明宗室女詞人朱中楣詞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4（2004），頁 132-140。
- 劉 麗，〈甲申之際明朝士人心態與選擇〉，《北方論叢》，2009：1（2009），頁 86-90。
-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 鮑家麟，〈明末清初的蘇州才女徐燦〉，收入《中國婦女史論集》，第五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 213-214。
- 戴曉燕，〈朱中楣之“夫唱婦隨”：明清之際才女文化個案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Li Wai-ye.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 It's Never Too Late to Be a Hermit: The Ming Imperial Clan Woman Zhu Zhongmei's (朱中楣) Experienc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Writings from Her Hometown

Chen, Yi-we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s the most popular topic in the field of power transfers in premodern China,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Ming loyalists. Still, few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women during the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talented women, Zhu Zhongmei(1622-1672). Zhu Zhongmei was a woman of the Ming imperial clan, but her husband, Li Yuanding (李元鼎, 1595-1670) worked as an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study describes how she faced the fall of Beijing in 1644 (甲申之變) and her life in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a study of her writing on changes and catastrophes in her countryside hometown. Zhu had a strong intention to remain a hermit, an intention in fact even stronger than her husban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ed light on the subjectivity of an important female intellectual.

**Key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Zhu Zhongmei, Li Yuanding, talented female, twice-serving official

---

\* M.A.,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